

黄志明股匪覆灭记

·姜 福 庆·

1951年3月29日上午，在奉贤县南滨杭州湾的里护塘堤下，15个五花大绑的囚犯跪在那里，象一具具雕刻的木乃伊。堤岸上，人海一片，发生狂飙般的吼声“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倒土匪！”声音震动了沸腾的空气，压倒了大海的涛声，发出了翻身农民心中的激愤。

距囚犯十步远的身后，一排荷枪实弹的执法队平举着枪，瞄准囚犯的后背，只等一声令下，把千万人的仇恨射向同一目标。枪声终于响了。“黄志明枪毙了！”人群又是一阵欢呼。黄志明带着那猥亵的形象和难以清算的罪孽倒毙在田埂上。他的干娘毛秀一一情报站长、胞弟黄志良、黄志忠等惯匪挨个儿一齐倒下，结束了这帮匪徒罪恶的一生。

为匪三投军，出尔反尔

事情追溯到1938年，22岁的黄志明因与家人发生口角，离开苏北同红镇老家，流落到奉贤县东港乡一致村（系解放初的村名），在熟人家暂住，种田糊口。时逢日寇侵华，社会治安混乱，本地浪人杨关楼等杀人越货，霸占一方，竟无一人敢管。出身地主家庭的黄志明早已受不住种田之苦，就跟着杨关楼入土帮泥坑。一年后，黄、杨两人因分脏不均发生矛盾，黄自立门户，于同年11

月20日伙同邬阿大、邬蔡大窜到杨家，用绳子将杨关楼夫妇活活勒死。嗣后，黄勾结日伪，认贼作父，充当日伪沿海守望队长，又怕别人来暗算报复，将家迁至青村朱墩地方（今塘外灯外村八组）居住。

当时，国民党中统专员、忠义救国军参议马柏生返回浦东一带活动。黄志明也知汉奸名声难听，是年底投靠马柏生，拜马为老头子，充当勤务兵，跟着马柏生摇旗呐喊，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为博得马的欢心，勾结王蔡才，以请客为名将从苏北回奉贤家乡探亲的新四军战士张小江杀死，死心塌地的跟随马柏生，以抗战为名，行杀人绑票、敲诈勒索，袭击我新四军游击队的勾当。

1943年，新四军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朱亚民部在浦东一带频繁袭击日寇，威震敌胆，名扬四方。黄志明投机钻营混入朱亚民部。然而，匪性难改，1944年9月，黄志明与五支队西南行动大队副黄志英一起，杀害了新四军淞沪支队奉贤西乡征收主任卫民，劫去全部钱款后叛变，重新投靠马柏生、丁锡三的“马丁行动总队”，任第二支队长，继续干名为国民党游击队，实为土匪的勾当。

1945年日寇投降，马柏生任战后第一任奉贤县长，黄志明随即被马先后委为青村镇长、宝善乡长，堂而皇之的当上地方行政官员，作威作福。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黄志明做国民党的行政官员仍不满足，于1948年又弃职重操流匪旧业。经常出没于青村、塘外、钱桥沿海一带，或抢劫、绑票、杀人、强奸，或

出海抢劫越货，危害四乡，人民切齿痛恨。

更换新主子，继续作恶

1949年7月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说来旅馆”，进来两名行踪鬼祟的客人。外人不知，他们正在密谈，商量成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五属浦东支队”（简称第二支队）。其中一个正是奉贤解放前夕潜逃上海的黄志明。另一人便是毛森系统的国民党“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指挥黄八妹的副官谢德胜。上海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了主，这帮惯匪岂能就此甘休？黄八妹委任黄志明为二支队队长，潜回奉贤，四乡海匪，进行破坏。黄志明受命后立即潜回奉贤家乡，组织了三个大队，委徐杏生和孔少良（大羊山人）为第一大队正副大队长；王福根（大羊山人）为第二大队长；胞弟黄志良为第三大队长。胞弟黄志忠为二大队第一中队长，经常组织匪徒出海与驻扎在大羊山的匪首黄八妹联络，成为黄八妹的得力心腹之一。然而，游腹奸诈的黄志明“聪明”过了头，1950年2月黄八妹的另一支匪特武装因缺粮向黄志明筹借，黄为保存自己实力，竟一口拒绝，致使两股匪徒在大羊山发生火并，黄匪惨败。从此，黄干脆脱离黄八妹系统，率领数十名残匪，独来独往于奉贤沿海，以大、小金山为基地，大肆进行海匪活动。

好景不长。同年5月舟山解放，黄志明觉得在海上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困难越来越大，于是带了胞弟黄志良、黄志忠等秘密潜往上海，其他匪徒仍出没青村、奉城两区沿海一带作垂死挣扎。黄兄

第三人潜入上海后，重新落脚到顺京菜馆找陆京士，把上次由陆率线组成二支队的情况和目前困境全盘托出。陆又将黄志明领到在上海的南通人黄步章处，投入了蒋经国系统的“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苏浙皖鄂指挥部江苏省指挥所”司令王振怀抱，王随即委黄志明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黄受委后积极搜罗旧属，发展同党，扩充组织。一面在上海市区筹组指挥系统，建立联络、情报和交通总站。委任黄的叔父黄志根为总联络站长；委任鼎新纱厂女工毛秀为情报总站长；委任吴兴根为交通总站长。又委任了若干名高级联络员和数十名情报员、交通员，经常秘密来往于奉贤乡下和市区，探刺我方情报。一面在原三个大队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大队编制的第四营，委奉城区东港乡一致村的张其根为第四营营长、奉城镇东门外的施汉文为副营长。骨干健全后，又大肆发展匪徒武装。至1950年底，黄志明的独立二支队已发展成拥有百余名匪徒，六艘武装海船、三四十支长短枪、数挺轻机枪的匪特武装。

旧恶添新罪，罪恶昭著

自黄志明扯起“忠义救国”、“靖难集团”的旗帜后，以上海为指挥基地，以奉贤的戚仓、朱墩、褚聚等乡为活动基地，经常流窜于金山、舟山、南汇及杭州湾沿海一带，猖狂从事骚扰、破坏人民政权的罪恶活动，妄图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罪恶昭著。

——他们搞突然袭击，枪杀我解放军战士，破坏我沿海军事设施。黄志明一伙匪徒先后数次在奉贤境内袭击我军事哨所，枪杀单

个行动的解放军战士2名，劫去步枪2支，并剥去军装，然后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行抢劫、强奸妇女，还连续3次切断我沿海防空站长途通讯线路，骚扰破坏我防空系统的设施。

——他们策反军警，刺探情报，伺机破坏。黄志明曾派遣联络总站女匪徒毛秀，带了多个年青女人从上海到奉贤褚家聚盐务所，以帮助盐警、盐工介绍对象为名，秘密策反盐警搞枪叛变，煽动盐工闹事。黄志明还亲自策反解放军奉贤县大队参谋梁玉璞充当内奸，以不断获悉我县剿匪肃特的计划，多次逃避了惩罚。黄志明又指使爪牙汤伯林、任顺章伪装积极，混入我基层政权，分别窃取了褚家乡长、朱墩乡农会主任之职，为黄匪的特务活动提供了方便。

——他们大肆造谣，制造混乱，蛊惑人心。黄志明为了配合蒋帮反攻大陆和破坏土改，派遣匪徒大肆造谣惑众，说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八月半来吃月饼。”说什么：“黄志明化装成妇女在乡下打游击，蒋介石快要回来”。说什么：“共产党像长毛一样时间不长了。”等等。一时乌烟瘴气，把当地群众扰得人心惶惶，不敢参加土改活动，不要胜利果实，给我巩固新生政权工作设置了障碍。

——他们抢掠财物，筹集经费，扩充匪徒。黄志明一伙可謂是两栖”匪徒，海、陆并举，大肆进行劫掠，在海上，他们备有六艘海船，携带长短枪、轻机枪以捕鱼为名，拦劫商船和渔船，晚上停留在羊山或大小金山住宿。同时，又经常潜回陆地，配合陆上匪徒

抢劫村民财物，充实活动经费，扩展匪特武装，配合蒋介石卷土重来。

剿匪靠群众，匪特暴露

共产党刚刚建立人民政权，若不能及时消灭顽匪，这必将失信于民。

黄志明一伙匪徒虽已作恶多年，但由于他们中间惯匪多，活动范围广，人民政府对他们可闻不可及，是一股狡诈多端，行踪诡秘的匪徒组织。他们内部规定：非生死兄弟、老党羽不得发展，如果发展要严经考验；对各种事与人，非绝对可靠者不予吐露。对于群众，大肆威胁恐吓，致使群众不敢向政府告发，这给公安机关的清剿行动增加困难。

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秋，奉贤县公安局和苏南海防公安局配合行动，进驻黄匪的老窝朱墩、褚聚、戚仓等乡。层层召开群众大会，控诉黄匪一伙的罪行，启发群众觉悟，打消顾虑。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充分依靠群众，从群众中培养物色积极分子，建立我们的耳目，对黄志明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和匪徒家属，进行座谈，号召他们深明大义，立即向政府自首登记，检举揭发，争取宽大处理。

通过发动群众，很快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密集的防线，揭发黄匪活动的线索源源而来。

——黄志明家乡的群众告发：土改开始时，黄志明出于报复破

坏的目的，趁黑夜放火烧毁了自家宅屋，家中熟睡的两个儿子差一点烧死，幸亏群众冲进大火得救。

——朱墩乡一群众检举，解放后黄志明经常与李堡村某人有联系，1950年3月在其家中隐藏多日，黄潜逃上海后，此人四次去上海与黄联系。

——褚聚乡群众揭发：渔民搭建的草房，经常有陌生海船停靠。另外，黄志明的干娘毛秀曾在10月6日从上海专程来乡下，联络了四人到乡长汤伯林家里秘密活动。

——1950年11月15日，朱墩乡一民兵报告：黄志明在昨晚6时许，带了三个人经过朱家村民兵岗哨时被人发现，黄即拔枪进行威胁。后黄等四人到他的舅媳家住宿，并派一人监视发现人。

——1950年11月16日晚，黄志明又到其舅媳家时，被另一民兵发现，当即高喊抓土匪，并向乡政府报告，而黄率人狼狽向外海逃逸。

.....

在群众不断向我提供情况、反映线索的同时，有五十多名黄志明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以及九名匪特人员向县公安局登记，投案自首，供出了独立二支队的组织和黄志明的活动情况。

为了证实黄匪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奉贤县公安局根据汇集起来的线索，将3月份以破坏土改罪名逮捕的张其根、施汉文等十三名罪犯进行突审。起初，张、施等罪犯认为我们未掌握他们有组织的

破坏活动，在3个月的审讯中，毫无进展。这次突审，张、施等知道隐瞒不了，逐供出了以黄志明为队长的“中国忠义靖难集团军苏浙皖鄂指挥部江苏省指挥所独立二支队”的组织情况，供认了张其根系第四营长，施汉文系副营长以及其他大队长、中队长、联络员、情报员四十余名匪徒名单，缴获了长短枪、派令等罪证，充分证明了以黄志明为首的匪特组织货真价实。

组织大搜捕，除恶务尽

这是一场红色扫荡。

从1951年1月中旬至下旬，由上海市公安局、公安17师、海防公安局、奉贤县公安局参加，在奉贤联合召开了侦破黄志明独立二支队的行动计划会。根据黄志明一伙主要活动在上海市和奉贤沿海等地，制定了城乡不同特点的搜捕计划。分工是：市区由上海市公安局、公安17师负责，组成市区侦查队，采取突破一点，跟踪追击，除恶务尽；奉贤乡下由奉贤县公安局、海防公安局负责，组织乡下侦查队，继续侦查，适时兜捕，一网打尽。

行动开始了。市区第一组侦查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调卡获得了毛秀的照片，采取秘密跟踪的方法，查清了长寿路东新村30号毛家的情报总站，并对其联络的匪特设网守候，一一密捕。第二组侦查人员负责监视联络总站黄志根家。3天后，发现有一行动神秘的乡下人经常出入，经辨认照片确认是联络员李思明。1月27日上午10时，我侦察员跟踪李思明至偏僻处，有意找茬将其秘密逮

捕。经过突击审讯，至晚8时李供出了黄志明的胞弟，系第三大队长黄志良的住处，在上海周家桥一面粉厂内，遂将黄志良逮捕。翌日凌晨4时，黄志良供出了黄志明（化名陆士忠）的地址，在中山路中山村长家港，门牌号码不详。侦察员命黄志良带路找到长家港22号黄志明的住处，但屋内已空无一人。原来27日黄得悉其弟被捕后，携带老妻、女儿又秘密潜逃。

匪首已惊闻。市区侦查队紧急命令各秘密监视点对黄志明在沪的联络点、情报站、交通站及其所有匪特分子立即采取统一逮捕措施，以捣毁“狡兔”藏匿的“穴窟”，迫使匪首自我暴露。至28日，独立二支队在沪的匪徒除黄志明外，全部落入法网。

同时行动的奉贤侦查队，对黄志明在奉城、青村两区的匪徒进行全面兜捕，在逃人员大部落网。

公安机关乘胜追击，接着对所有拘捕匪徒进行审讯，根据不同特点采取逐个分化瓦解的策略，最后，情报员吴阿苟和联络总站长黄志根，表示愿意为我方工作，于是“放线钓鱼”。

1951年3月，交待释放的吴阿苟向侦查队报告：黄志明曾于2月28日到其亲友家借过钱；黄志根也提供了自己的老佣人与黄志明还继续保持联系的情况。3月17日，侦查人员与该老佣人正面接触，通过政策教育，老佣人供出了黄志明在凌晨4时已到他家等重要线索。

狐狸尾已终于暴露出来了！侦查队即刻部署了擒获黄志明的方

案。

当日，在老佣人家附近出现了几个小摊小贩及脚蹬三轮车的人，约一支烟工夫，老佣人家中出来一个人。西装头、长衫，俨然一副体面人的派头，却小心翼翼地溜上了马路，他就是匪首黄志明。他匆匆走到一辆黄包车旁，向车夫招呼一声便坐进车内。车夫不露声色地说：“先生！好勒！”话毕，蹬起车就走。此时，前后左右的小生意人也随车跟上，黄志明见如此前呼后拥觉得不妙，伸手招呼想下车，手却被拽住，猛然向后一反，一扭，套上了锃亮的手铐。

至此，黄匪一案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公安17师、苏南海防公安局、奉贤县公安局历近一年的侦查，在大陆上的匪徒全部落网，捕获了以支队长黄志明以下武装匪徒分子五十四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海船六艘，以及大量弹药、关防、旗令等。

1951年3月24日，经苏南人民政府公署松江专员公署核准，判处匪首黄志明及其骨干分子死刑。3月29日，在奉贤县朱墩乡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随着一阵枪响，黄志明这个总贯浙江、血债累累的匪徒分子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解放前夕的一张公报

——施超权——

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已紧逼长江北岸，正等待时机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总部南京。而活跃在奉、

南、川三县的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为配合大军过江解放浦东和上海正在积极筹集粮款，并不断打击阻挠我们工作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则妄图以长江天险为防线阻挡我大军南下。加强江南沿江防线和所谓强化治安，在浦东三县就凑集成千以青年军为主的各路武装，以对付浦东总队。在这时，奉、南两县几个集镇上出现了一份趣名为《学生报》的油印小报。小报的版可编排有致，字迹工整清晰，小报虽小（双面印的八开纸），但内容殷实：报上有解放军到处打胜仗的消息，有宣传解放区拥军爱民、军民一家的小故事，有驳斥国民党所制造的“共产党共产共荣”的辟谣栏，有揭露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欺压民众的报道，也有反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学生和民众感到前途渺茫而对现实不满的小说和诗歌。这份小报给当时政治空气窒息的国统区如同送来一阵清新的春风，又如给久渴的人们送来一股清泉，小报在群众间争相传阅。

一天早饭后，在南汇的大团镇上我寻同一片名为“南自”的商店，见两个店员正凑在一起看《学生报》，他们见我走近，慌忙将小报遮掩起来。我见此心中好笑，因为这份小报正是由我编印的，也正是由我和同伴益才坤等人在深夜里密塞进他们店门的。

我是奉贤四团人，当时我和三个初中时思想激进的同学一起在施鼓铜桥（现四团乡夏家村）启智小学教书。老同学吴士林他哥哥陈友新是朱亚民游击队里的干部，他的家在我游击队活动地区。由

于接触革命队伍，他的思想进步）常来我校。有一次他同我商议，办一份小报来揭露国民党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我大军解放浦东和上海作舆论准备，我当即表示赞同。以后，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浦解总队总队长吴楚功，将我们的意图告诉了他，他听了很高兴，表示积极支持。接着我们又去找了在大团浦东中学就读时的老师宋亚，请他帮助组稿，他也欣然同意。宋老师是四团北边的宋家宅人，他家有个用干电池作电源的收音机，他常用它来收听我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我们小报的许多稿件就是由宋老师笔录或组写的。他还组织其他进步老师为我写稿；我们自己也组织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如王三锡（现为南京医学院教授）等人写稿，除此还在《前哨》等进步刊物上摘录正面宣传共产党的文字。总之，我们的稿源是充足的。

小报的编排刻印就在我任教的启智小学。这学校位处离集镇较远而又是浦解总队常出没的农村，该部的中队长朱伯英家就紧靠我们学校。每当校长离校回家，我们几个老同学就开始办报。报纸一印好，就由我和盛才坤等人借助夜幕分头摸进奉城、四团、大团、三墩等地去分发。

在发报时为避免被通宵巡夜的巡逻队碰见，我们先由一空手的同伴走在前面探路，带报纸分发的人藏在后面，相距一二百米。前面的同伴如迎面碰上巡逻队就咳嗽两声，带报纸的人便可躲进小弄或厕所。这些地方的地形，我们都很熟悉。有一次，我和盛才坤在

大团发报碰到巡逻队，就是用此法躲过敌人的。

这份报纸虽小，但在群众中的反响很大。我们常装作不知情的人，故意到我们熟悉的人家去借阅《学生报》，借此听取他们对小报的反映。我在四团就曾听见一位姓崔的医生对小报的议论。他说：“过去我们听了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党很害怕，看了小报，才知道共产党对老百姓是很好的；对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想必也不会差，总之“万税”国民党好吧。可惜这份小报在出了两期后，被驻在四团的保安团管长禹尊鼎发觉了，据传要来我校查抄，于是我们被迫离开启智小学，而《学生报》也只得停刊。

这份小报只出了两期，是一颗流星似的一晃而过，但它们强烈闪光却照亮过不少人的心灵。特别是我们十几个参加过办报或与报纸有联系的年轻人，受到了革命的熏陶，上海一解放，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解放军，四十年来，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今为纪念我县解放四十周年，我愿将这枚在解放奉贤前夕的经历写出来，以飨我县读者。

解放初期的县卫生院和医疗卫生工作

·孙可夫、赵元·

1949年5月14日奉贤解放，18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后开始对全县进行接管工作。6月正式接管旧公立卫生院，改称为“奉

贤县人民政府卫生院”。

解放前的这所公立卫生院，主要业务是专搞戒鸦片烟的，设备简陋，规模极小，人力、物力，技术水平都很差，对社会医疗卫生很少过问，偶然遇到严重疫情，才搞一下社会医疗卫生工作。

解放初的这所公立卫生院院址在南桥协和弄西首旧平房内，大小房屋11间，约200平方米，留用人员正副院长、医生、护士各一人和勤工两人，加上我们去接管的两人，共七人。药品器材用具更是简陋，药品主要是少量原“美援物资”中的奎宁片，阿的平和外用的消炎粉及急救包，还有几条军用棉胎、门诊应用药品和小件器材如体温表等也很少，难以应付门诊业务。虽有病房三间、破旧竹、门板床十张，实际只有5张病床可用。解放初期，县财政收入无着，留用人员工资也暂难发付，药品器材部分是向留用人员处借来应付门诊需要。在这种条件下，医院只能开展以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医疗门诊，病人当然很少。

1949年10月28日，蒋机侵入本县狂轰滥炸，由于急需对伤病员抢救，由松江专署拨款添置了一些应急器材药品，以后逐步得到县财政拨款资助，并对群众开放，增加医疗业务收入，医院业务也得以逐渐发展。1950年医务技术人员增加了12人。1951年医院搬迁到现招待所所在地，病床增设为24张，并由苏南卫生处拨给美制高倍显微镜一架、开始筹建化验室。

1952年，苏南卫生处拨款3.2万元作为医院扩建经费，另

发 5000 元作设备添置费，同时将原江阴县卫生院院长赵元调来奉贤主持院务。当时既无设计机构，又无施工组织，基建材料也不能配套供应，真是困难重重，县长王琳亲自挂帅，指令县建设局长协助设计，将原国民党遗留在海塘上修筑碉堡用的园木，砖料调拨给医院使用，并调配得力干部来工地工作。没有设计图纸，我们就按照医院业务需要，和现有的基建材料和南桥当时的能工巧匠张银林等共同研究制定方案，投计了含 12 间病房，可容 58 张病床及各科辅助用房，六间门诊（含手术室）及六间办公室，一间过堂，总面积约 700 平方米，当年 11 月破土动工，由于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工程进展快，质量也好。短短三个月就完成了一幢具有奉贤特色的医院建筑，清砖、红墙、墨瓦，红漆的门窗地板，全部泥漫条平顶，整齐划一，气象一新。此年，全年门诊 1.4 万余人次，住院 500 多人次。

1953 年 3 月医院门诊、病房全部迁入新房。当年门诊和住院人数都较上年增加了 30% 左右，并开展下腹部手术。医院的扩建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解放初，全县医疗卫生情况都很差，公立医院仅县卫生院和奉城区卫生所两处，全县医务人员约 300 余人（包括学徒在内），大多数是中医，西医不足 10 人，而符合西医师资格的仅二三人，中医虽多，符合资格的亦不足 10%，且散居于各乡镇。为了增加收入，大部分兼带打针卖药，医疗费用昂贵，群众看不起病，往往小病拖

大，大病拖死。

城乡卫生环境也很差，乡镇街头巷尾粪缸、垃圾、臭水浜比比皆是，饮水水源受到污染，群众喝生水很普遍，由此引起疾病的不少。一到夏天，蚊蝇成群、危害人民，各科传染病蔓延丛生，特别是血吸虫病，几乎遍及各乡镇，严重威胁全县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1949年五六月发动社会医生展开全县性的霍乱预防接种，7月炎夏，县政府在南桥镇组织社医义诊活动，为贫民义务看病。以后设卫生科，加强对医院工作的领导，还增设防保组、妇保所等，单独建立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又将各乡镇分散的社会医生分别组成20多个联合诊所，方便群众就诊。县还成立防疫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善奉贤城乡医疗卫生面貌，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

——纪念建国40周年 · 陶颖祥 ·

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并执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方针、政策，达到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之际，回顾我4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深知党的对私改造政策的无比正确，是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

一、保护民族工商业所制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

政策是建国初期的重要政策之一。

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加以利用，并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银行贷款帮助恢复生产；组织私营企业参加华东、苏南两次物资交流，以及本县各乡镇14次初级市场的物资交流；说服工人放弃一些眼前利益，帮助资方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引导工商业者稳定情绪，积极经营，满足城乡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上的需求。对采取消极态度，企图关厂停店、解雇工人，偷逃税收、投机倒把的工商业者，坚持批评教育，对严重违法的则坚决斗争。例如：南桥鼎丰酱园、头桥利昌花厂等违法事件，给以法律上应得处分。通过“三反”，“五反”，教育工商业者爱国守法，限制其消极思想发展，达到改造目的。

同时，还利用工商业者游资下乡，帮助农村恢复生产，完成国家税收，支持国家建设；抗美援朝战争中捐献飞机大炮款；超额完成各期公债；为争取建国初期财政经济进一步好转贡献一份力量。

工商青年组织剧团，并吸收部分职工、农民参加，费用由工商联负担，配合各项运动进行宣传；学习会上请学校教师教唱革命歌曲；组织乐队，参加集会游行，发挥积极作用。

二、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到公私合营，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私改造之路。

建国初期，米粮业为中粮公司代购税粮，占当时总收购量的14.7